

研习心得

劉金成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

2017年8月，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以“荆楚文化”为题的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，期间收获颇丰，实是不虚此行。在研习营的精心安排下，学术讲座、田野考察以及小组讨论的丰富内容都让我获益匪浅。特别于宗教学专业出身的我，在诸位老师的教导下，与来自文学、历史专业的同学们一起学习，彼此砥砺、共聚切磋，打开了思考视野进而尝试从更多角度探究以往专注的研究领域。

在讲座之外，研习营安排了对钟祥、襄阳、武当山、随州等地的田野考察。配合此次武当山考察之行，营队老师在《考察参考资料》里就节选了《大岳太和山纪略》和《大岳太和山志》的部分内容，以助研习。

关于武当山的山志历朝历代都有编纂修订，虽有亡佚一二，而现今可见明清两代的版本也有不少。《资料》所见之《大岳太和山志》未言明版本情况，经过与《三洞拾遗》所录之志相对照，此志应是为明宣德六年（1431）任自垣所纂修的十五卷本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》。《大岳太和山志纪略》则是清代乾隆九年（1744）王槃所修八卷本山志，两志可视为明清两代武当修志之一掠影。

两部山志因撰于不同年代、由不同之人所修，篇幅有卷数亦有增减，且各自有其特殊的编纂背景，皆有不同之处。同时，二志于其撰述之旨意，虽有道士羽流参与其中，但仍多是以仕宦为代表的官方之言。通观二志，则都给出了“圣纪”的撰述。所谓“圣纪”，即是对圣者言行、事迹的纪录，以显示其地位之尊贵。两部山志的“圣纪”都是围绕玄天上帝进行的神圣书写，大致记述了玄天上帝降圣显化、修行得道的灵应故事，其中多有相同之处。之所以多有相同，可能是因为这两部明清山志于“圣纪”的书写都有所本，而所依据者很可能就是《玄天上帝后圣录》。《正统道藏》所见之《玄天上帝后圣录》总计八卷，其中第一卷就是玄帝降生度世之事迹，与两部山志所载之“圣纪”可相参照。

当然，山志中的“圣纪”不仅仅是与《玄天上帝后圣录》密切相关，也还参杂了其他的道教经书，融汇了不同来源的真武传说。据《大岳太和山志》所见之“圣纪”之末就附言：“余载本传经”，而“本传经”则是《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》。《大岳太和山纪略》所载“圣纪”则有部分不见于《玄天上帝后圣录》，而见于《武当福地总真集》的“玄帝传记”。此外，《纪略》之“圣纪”

述玄帝“往镇北方，统摄元武之位，以断天下邪魔”，乃是本自《元始天尊说北方玄武妙经》“执掌北方，统摄真武之位，以断天下妖邪”之句，此于《大岳太和山志》之“圣纪”所不见。由此可识，玄帝圣纪之总体内容虽大致无差，然于流传之中仍可见不同之版本。

清乾隆年间刻本《大岳太和山纪略》的“圣纪”末尾附有按语一段，和在民国年间所修的《续修大岳太和山志》之末所附按语文字无差，其大意是圣纪多言神异而荒谬不经，不具有考辨之价值，并言“王元美以为道士附会不必辨也”，这应是出自以王槩为代表的编修山志者之论。有意思的是，与明代《大岳太和山志》的“圣纪”对照，《纪略》所载“圣纪”中出现了将“玄帝”全改为“元帝”的文本现象。就《纪略》的刊行时间来看，其间应是与避讳康熙帝玄烨之名有关。而于真武的避讳现象，于“按语”中亦有说明，“按真武即元武，《明史·礼乐志》云：因避宋真宗讳改元为真武。”考之《明史》卷五十一，确有言之“宋真宗避讳改玄武为真武”，然据文末按语所言非为避宋真宗之讳，其言之“考宋纪真宗初名元朗，即位改名恒，于讳无所犯，其易圣号之故无所据”。此话确实不虚，玄武改为真武的避讳现象确实如其所言不是避真宗讳。正如按语指出的那样，“于讳无所犯”，玄武之圣号与宋真宗之名讳之间存在避讳的关系不大。然而，或许不能就此诋毁道门怪异荒诞，指摘诸神众真之圣号于改易是恣肆随意之举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按语既已指出避讳真宗之不实与明史所述之欠缺，但是却因受到了谤道倾向的影响而未能准确校正。玄武避讳“玄朗”诚为不假，而此事确也与宋真宗有关。其实，“玄朗”之名乃是宋真宗所造作神真的圣号名讳，此一神明不仅是授受天书的道教神明，更是被赵家奉为祖先遂称“圣祖”。因此，赵玄朗以神圣尊贵的身份地位，其名号当为避讳。是以，道教之神玄武所避之讳应为被宋真宗奉为“圣祖”的赵玄朗。“按语”的作者在这里的语出不当，或许就是忘了道教史上两个神仙之间的纠缠和瓜葛。

在这心得的最后，我要衷心地感谢“两岸历史文化”研习营给予我这次参与机会，感谢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感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！感谢诸多老师的悉心教导，特别是李丰楙老师，以其于道教研究上的深厚功底总是不倦地为我等解惑答疑，令人景仰；还有郑振满老师，他在田野期间常常是顶着烈日一身大汗带着大家找庙读碑，令人感佩；以及李孝悌老师和王鸿泰老师，感谢他们多年来于两岸研习营工作上的执着坚持和热情投入，令人尊敬。难忘的还有与各位同学们在研习营期间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，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忆将是永远的纪念。